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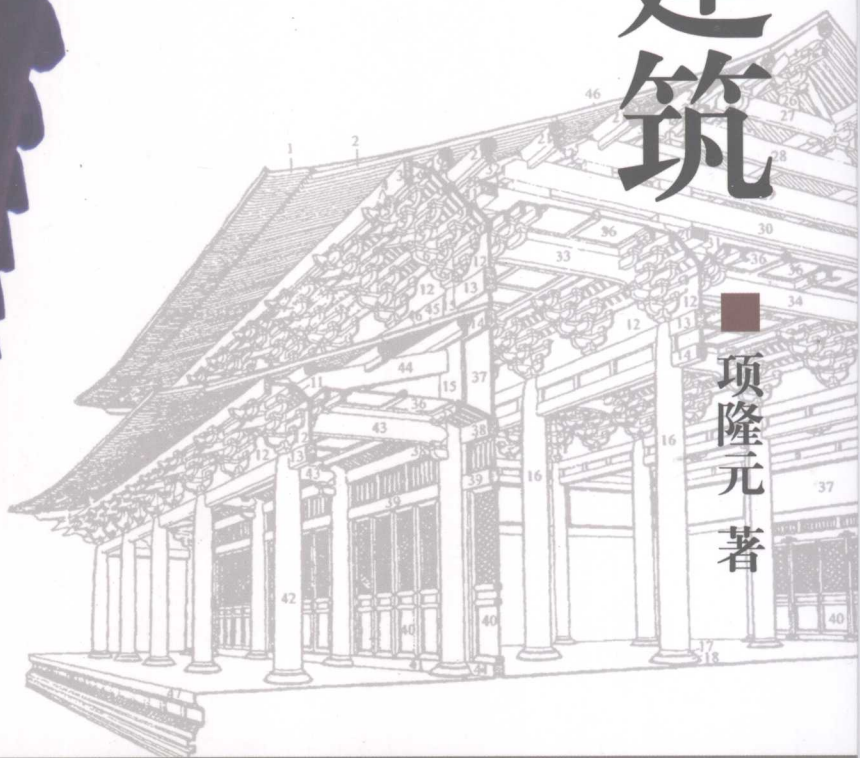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营造法式》

YINGZAO FASHI YU JIANGNAN JIANZHU

与江南建筑

■ 项隆元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资助课题

《营造法式》

与江南建筑

■ 项隆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 / 项隆元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3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8-06512-2

I. 营… II. 项… III. ①建筑史—中国—古代②建筑艺术—研究—华东地区 IV. TU-092. 2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959 号

《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

项隆元 著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518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512-2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论 《营造法式》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	001
第一节 近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关注	001
一 “中国热”与中国建筑	001
二 “非历史的历史”与“非历史的建筑”	003
三 东方艺术史与中国古代建筑	005
第二节 中国营造学社与古代建筑研究	007
一 中国营造学的创立	007
二 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就	009
三 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023
第三节 当代建筑史学与《营造法式》研究	025
一 建筑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025
二 《营造法式》研究的新成就	026
第一章 《营造法式》作者、主要内容及版本流传	029
第一节 《营造法式》的作者	029
一 “李诫”与“李诫”	029
二 李诫的生平	031
第二节 《营造法式》主要内容	033
一 《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劄子》与《看详》	034
二 《总释》与《总例》	039
三 诸作制度	043
四 功限与料例	044
五 诸作图样	045
第三节 《营造法式》卷目	046
一 “后人并省”说与“传抄致误”说	046
二 “屋楹数”与《营造法式》	049
第四节 《营造法式》版本流传	052
一 宋代刻本	052
二 元明清时期的宋刻本与抄本收藏	055
三 当代《营造法式》版本	059
第二章 《营造法式》的性质、特点与价值	061
第一节 《营造法式》的性质	061
一 工官与将作监	061



二 法式与规范·····	062
第二节 《营造法式》的特点·····	063
一 考究群书,厘定术语·····	063
二 制订制度,明确规格·····	065
三 确立定额,比类增减·····	066
四 别立图样,以明制度·····	067
第三节 《营造法式》的价值·····	068
一 《营造法式》与中国古代建筑结构及演变·····	069
二 《营造法式》与中国古代建筑模数制度·····	074
三 《营造法式》与中国建筑的单体造型和装修·····	078
四 《营造法式》与工官制度·····	082
第三章 《营造法式》壕寨与石作制度·····	084
第一节 壕寨制度·····	084
一 立基与筑基·····	084
二 筑城与筑墙·····	086
第二节 取正与定平·····	088
一 取正·····	088
二 定平·····	090
第三节 石作制度·····	092
一 石构建筑与石制构件·····	092
二 造石作次序与雕镌制度·····	093
第四节 宋代常用的石构件与形制·····	097
一 台基·····	097
二 角石、角柱、压阑石·····	098
三 殿阶螭首、殿内斗八·····	098
四 踏道·····	099
五 门砧限、地袱·····	099
六 柱础·····	100
七 钩阑、螭子石·····	101
八 坛·····	103
九 流杯渠、卷犖水窗·····	103
十 水槽子、马台·····	104
十一 井口石、山棚趺脚石、幡竿颊·····	105
十二 螭趺坐碑、笏头碣·····	105
第四章 《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	106
第一节 用材制度·····	106
一 用材制度的内涵·····	106
二 用材制度的意义·····	107



三 用材制度的变异·····	111
第二节 铺作的含义及构成·····	112
一 铺作的含义·····	112
二 造拱之制·····	113
三 造昂之制·····	114
四 造斗之制·····	117
五 耍头与衬枋头·····	118
第三节 铺作的组合与分布·····	118
一 铺作组合·····	118
二 铺作分布与分槽·····	122
第四节 建筑的分类与大木构架类型·····	123
一 《营造法式》对建筑的分类·····	123
二 构架类型·····	124
第五节 大木构架的主要构件·····	129
一 柱·····	129
二 蜀柱与叉手·····	130
三 梁枋·····	131
四 角梁·····	132
五 阑额·····	134
六 搏·····	135
七 替木与搏风板·····	136
八 椽·····	136
第六节 屋顶与举折·····	137
一 屋顶·····	137
二 举折·····	139
三 檐·····	141
第五章 《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	142
第一节 门类与窗类·····	142
一 门类·····	142
二 窗类·····	149
第二节 隔断类、天花类与障隔类·····	153
一 隔断类·····	153
二 天花类·····	158
三 障隔类·····	160
第三节 佛道帐类与杂件类·····	163
一 佛道帐类·····	163
二 杂件类·····	166
第六章 《营造法式》雕作、旋作、锯作与竹作制度·····	172
第一节 雕作制度·····	172



一 雕镂题材与技法	172
二 木雕部位与使用题材	176
第二节 旋作制度	177
一 殿堂等杂用名件	178
二 照壁板宝床上名件	179
三 佛道帐上名件	179
第三节 锯作与竹作制度	180
一 锯作制度	180
二 竹作制度	180
第七章 《营造法式》瓦作、泥作、砖作与窑作制度	183
第一节 瓦作制度	183
一 瓦的规格、用途及结瓦制度	183
二 垒脊与脊兽制度	186
第二节 泥作制度	189
一 垒墙、垒射垛与用泥	189
二 立灶制度	190
第三节 砖作制度	190
一 砖的品种、规格及用途	191
二 垒基与铺地	193
三 其他	195
第四节 窑作制度	197
一 砖坯与瓦坯	198
二 烧变次序与垒窑制度	199
第八章 《营造法式》的功限与料例	201
第一节 功限	201
一 壕寨与石作功限	201
二 大木作功限	205
三 小木作功限	207
四 诸作功限	208
第二节 料例	209
一 以材料为准定额	209
二 以工程项目为准定额	210
三 用钉、用胶料例	211
四 诸作等第	213
第九章 《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	214
第一节 彩画工艺	214
一 工艺流程	214
二 衬地之法	215



三 调色之法·····	215
四 衬色之法·····	216
五 用色原则·····	216
第二节 彩画种类·····	217
一 五彩遍装·····	217
二 碾玉装·····	224
三 青绿叠晕梭间装·····	225
四 解绿装饰屋舍·····	226
五 丹粉刷饰屋舍·····	228
六 杂间装·····	229
第三节 其他刷饰·····	229
一 小木作刷饰·····	230
二 屋顶、墙面·····	230
第十章 《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的关联·····	231
第一节 唐宋时期建筑成就与江南建筑的发展·····	231
一 唐宋时期建筑成就·····	231
二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江南建筑的发展·····	243
第二节 《营造法式》编著过程与初祖庵大殿建筑特点的启示·····	249
一 近年有关《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关系的探讨·····	249
二 《营造法式》编著与重刊的启示·····	251
三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建筑特点的启示·····	253
第十一章 《营造法式》与江南宋元时期木结构建筑·····	259
第一节 江南宋元时期木结构建筑·····	259
一 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	259
二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	263
三 江苏苏州玄妙观三清殿·····	263
四 福建莆田元妙观三清殿·····	266
五 上海嘉定真如寺大殿·····	267
六 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	268
七 浙江金华天宁寺大殿·····	270
第二节 《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的形制与样式·····	272
一 构架与柱梁·····	272
二 铺作与斗、拱·····	278
三 其他·····	282
第十二章 宁波保国寺大殿的构造与特色分析·····	284
第一节 宁波保国寺概况·····	284
一 历史沿革·····	284
二 建筑布局·····	287



三 主要建筑·····	289
第二节 宁波保国寺大殿构造·····	292
一 建造年代·····	292
二 台基与平面·····	292
三 柱与柱础·····	294
四 构架·····	294
五 铺作·····	295
六 屋顶与举折·····	297
七 装修·····	297
第三节 宁波保国寺大殿的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299
一 保国寺大殿的时代特点·····	299
二 保国寺大殿的地方特色·····	304
附录 《营造法式》研究论著目录·····	310
后 记·····	316



绪论 《营造法式》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

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建筑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建立后逐渐展开的。从中国营造学社名称看,其“营造”两字即取自于宋代的《营造法式》,因此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首先是从关注《营造法式》开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创立的以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和所取得的大量实证性成果,为中国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虽然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营造学社于1946年无声地消失了,但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余波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文物建筑保护。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多学科的关注和各类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把中国建筑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一节 近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关注

在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心的一批中国学者运用近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开始探究中国古代建筑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已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所关注。他们的研究活动与成果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产生过一定影响。

一、“中国热”与中国建筑

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关注与近代欧洲出现的“中国热”(Chinoiserie,也称“中国风”)密不可分。所谓“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和崇拜中国文化,仿制中国物品的文化现象。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乃至19世纪初。正是在“中国热”兴盛的背景下,从英国、法国、瑞典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崇尚和模仿中国园林、房所、家具、服饰、器皿等热潮。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介绍中涉及中国建筑的,往往以神秘主义的色彩为基调,以马可·波罗的“传说”为模式,向人们传递的是神话般的联想而不是真实的物像。自1515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驶进中国港口进行直接通商贸易开始,中国瓷器、漆器、工艺品及丝、茶等遂大量输入欧洲;继之,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兴起了通向东方的远洋贸易;接着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频繁的商贸和传教活动,为“中国热”时期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基础。

17世纪前后,欧洲已出版了多部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撰写的介绍中国的著作,例如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



年)^①、意大利人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年)、德国人基尔彻的《中国图志》(1677年)、法国人李明的《今日中国志》(1696年)、法国人杜哈德的《中国全志》(1735年)等。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古代经典。最先出版的是意大利人殷铎泽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1662年)和《中庸》(1673年)。接着,比利时人柏应理又重译了这两部典籍和新译了《论语》。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文的《中国六经》,除了柏应理上述三种译著外,还收录了比利时人卫方济新译的《孟子》、《孝经》和《三字经》。这些有关中国著述的出版和流传,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在建筑领域,对欧洲产生过实质性影响的是中国园林建筑。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首先得到法国路易十四的赞赏,1670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依宫。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院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英华园林”(Anglo-Chinese style garden)的新风格。

在“英华园林”的形成中,英国人钱伯斯是一个重要人物。钱伯斯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商人家庭,子承父业,16岁时以一艘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押运员身份来到远东,20岁时再度前来。随后,他放弃商业,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建筑。在停留广东的短短数月里,钱伯斯走访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并测绘了不少建筑和园林。1755年,钱伯斯经在罗马、巴黎深造后,回到英国,定居伦敦从事建筑业,并最终得到英王乔治三世的赏识,从而奠定了他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和发展前景。在他的建筑生涯中,写有两本直接介绍中国的园林和建筑设计的专著。一本是《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出版于1757年。这本“前言”4页、“正文”19页、“附图”21幅总共不足50页的小册子,其貌不扬,但被多次再版、转载,可见其影响之大。另一本是《东方园艺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也许是钱伯斯对中国的园林设计意犹未尽,也许他另有所思,在他的《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出版15年后,即其事业处于鼎盛时期的1772年,出版了《东方园艺论》。此书着重介绍了中国造园艺术,并极力提倡在英国风景式园林创作中应吸取中国园林趣味。虽然此书篇幅也不大,连同“前言”在内才有94页,但它却成为18世纪末欧洲园林设计所遵循的典范之一。

除了著述,钱伯斯还在英格兰建造了一些仿造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丘园便是钱伯斯的得意之作。丘园中建有异国风情的建筑,尤以中国风格的宝塔最为夺目。该宝塔成为丘园的标志性建筑。钱伯斯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推崇有加,认为中国园林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弃人为,它的设计原则,在于创造各种各样的景致以适应理智的或情感的享受,这是因为中国造园家通常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艺术素养。显然,这是钱伯斯对中国园林“虽有人作,宛如天开”的设计追求的另一种解读。之所以强调“人为”,这是与钱伯斯反对以布龙为代表的纯田园风景式的园林创作理念有关。在当时欧洲建筑与造园界,钱伯斯“人为”的园林创作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争议,但由于钱伯斯在建筑界显赫地位,这种争论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影响力,相反地,他所提倡的“英华园林”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写意式园林,一度成为欧洲的时尚。

受英国的影响,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中国园艺热,纷纷步英国之后尘,开始建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园林。如在德国的波茨坦的无忧宫、慕尼黑的纽芬堡宫等皇家宫苑和庭

^① 此书由比利时人金尼阁翻译整理,中译本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在华沙的御花园中,也建起了中国式的桥和亭子;瑞典则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郊外建起了中式园厅等。比起其他国家,法国追求中国情趣似乎更为强烈。可惜法国在此时建造的许多中国式的园林大多被毁,目前我们已不可能从中了解当时的实情。好在1774年法国人勒·鲁特所写的《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is*)一书中,对当时法国的“英华园林”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在勒·鲁特的著作中,以版画的形式描绘了许多园林,从中可以见到有许多中国式的亭、榭、塔、桥分布在各个美丽的自然式庭园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称之为“中国式建筑”的建筑,大多只有用18世纪的眼光来衡量,才能算作中国风格。像尚特鲁庭园中的塔,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和中国的原型有相当大的差距。

自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热”虽然是普遍的,甚至是狂热的,而且这一热潮延续到19世纪初叶,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肤浅的,对中国建筑文化的了解同样是猎奇多于探究。

二、“非历史的历史”与“非历史的建筑”

随着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迫开埠和外国租界纷纷设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和科技历史的“主流”在欧洲,自然,世界建筑的中心和历史的主流也在于西方建筑。^①在“中国热”时期为欧洲人所热衷的中国建筑文化,也由此而“冷落”为欧洲人笔下的“非历史的建筑”。

“非历史的建筑”这一概念显然是借用了黑格尔对于中国和印度历史所用的“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一语。在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学框架中,一个文化只有包含变化、新的事物和进步这三个因素,才能构成历史。虽然他承认中国有一部很完备的用文字书写的历史,但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是在时间中绵延,因此只有延续,没有变化,因而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眼中,中国固然有改朝换代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纯粹人事上的变化,而不是一个社会根本组织的改变,因而没有新的事物的出现,也没有使一个文化由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的进步发生。黑格尔对中国或东方历史所下的“非历史的历史”的判断显然失之偏颇,但其影响却不小。在西方的建筑史研究领域,“非历史的建筑”这一概念提出就与其有关。

“非历史的建筑”的概念,是英国建筑史家弗莱切在其权威性的著作《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中提出并首先运用的。弗莱切的《比较建筑史》是一本建筑史领域的名著,从1896年至1996年的百年间,就修订再版了20次,可见其影响之大。但是,受欧洲“中心论”、“主流论”和“非历史的历史”思想的影响,加之材料上的局限,该书在1987年第19版之前,对中国等东方建筑的认识,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偏见。在弗莱切看来,欧洲建筑是“历史性样式”(Historical Style)建筑,它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从古埃及到现代英国的建筑之中,具体表现为由古典建筑所代表的梁柱体系建筑向哥德式建筑所代表的拱券体系建筑的转变。而中国、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国家的建筑是“非历史性样式”(The Non Historical Styles)建筑,其最大特点不在于它的结构而在于它的装饰,它的装饰设计往往超过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在1901年出版的该书的第4版上,增加了著名的“建筑之树”(The Tree of Architecture)的相关内容(见图0-1),进一步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

^① 李允铎:《华夏意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弗莱彻对于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古典建筑性质与价值的理解与判断,即:中国建筑等东方古典建筑不仅是“非艺术”、“非主流”的建筑,而且是“非历史”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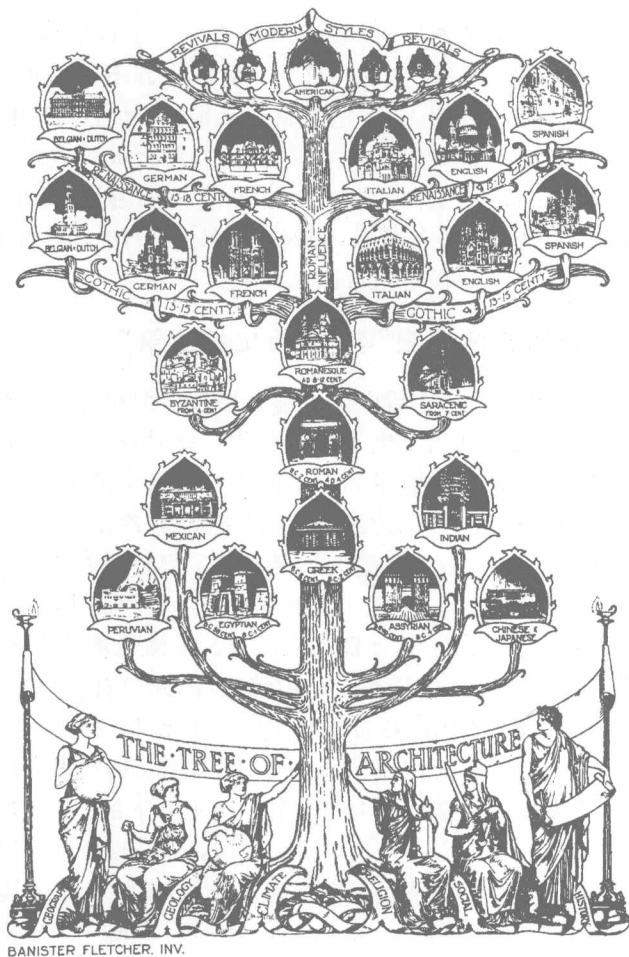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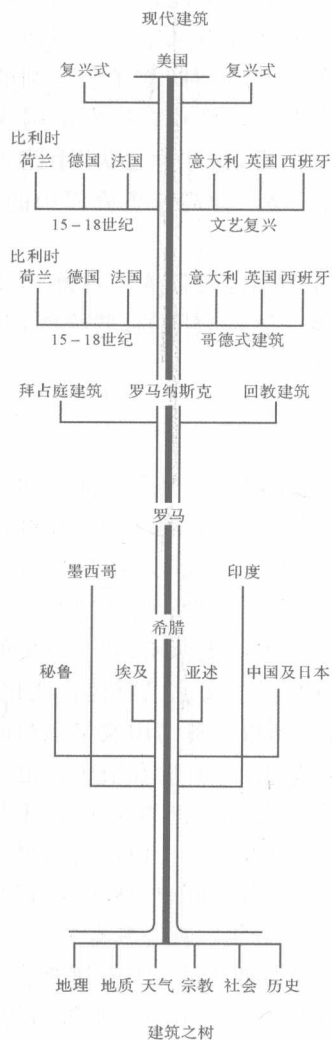


图 0-1 弗莱彻“建筑之树”(采自李允铎《华夏意匠》,第 12 页)

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建筑史著作颇多,在弗莱切之前,英国人弗格生在其《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已有类似的表述。弗格生认为中国建筑和中国其他艺术一样低级。它富于装饰,适于家居,但不耐久,且缺乏庄严、宏伟的气象,因此中国建筑并不值得太多的注意。不过,他认为中国建筑有一点具有启发意义,那就是中国人是唯一视色彩为建筑一种本质的人。

将非欧洲的建筑称作“非历史的建筑”,并把它们排斥在世界建筑发展的主流之外,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观点引起了大部分被涉及的国家地区的建筑学者的不满,也受到了当代西方学者的批评。在 1961 年出版的弗莱彻《比较建筑史》第 17 版中,已用“东方建筑”(Architecture in the East)替代了“非历史性样式”,“古代建筑和西方的继承和发展”(Ancient Ar-



chitecture and the Western Succession)替代了“历史性样式”;与之相应,“建筑之树”也被取消了。这一情形虽然来得晚了些,但这毕竟说明一种新的建筑历史观念开始形成。

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认知和研究存在较大的偏差,但还是比上一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一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建筑类别的关注面有明显的扩大。从“中国热”时期主要介绍和模仿园林建筑,扩大到包括对城市、宫殿、庙宇、园林、民居等在内的各个建筑类别的关注,显示出西方人介绍和研究中国建筑的广度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德国人鲍希曼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间穿越了中国的12省,行程数万里,拍下了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建筑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陆续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其中有:《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1911年)、《中国的建筑艺术和景观》(1923年)、《中国建筑》(1925年)等。虽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鲍希曼这些图文并茂的著作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得以出版,但在当时的欧洲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瑞典人喜龙仁曾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记录,并于1924年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北京城墙、城门提供了难得资料。^① 尽管由于专业素养所限,书中的测绘图不够规范,但此书仍然是记录北京城墙、城门的最翔实可靠的文献。

第二,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特点的关注开始运用艺术与技术的双重视角。建筑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技术。相比较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建筑艺术方面,而这一时期,由于建筑史学家的介入,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历史、建筑技术的关注逐渐得到加强。上述的弗格生和弗莱切是两位著名的建筑史学者,他们看待中国建筑便是主要从技术入手的,虽然因材料和观念上的局限,对中国建筑技术的评价并不到位,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也显示出西方人开始较多地从技术角度考察中国建筑的一种趋势。一旦克服了观念上的局限,纯粹从技术角度分析建筑,其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显得更客观一些。在1899年出版的《建筑史》(*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中,法国人舒瓦西在分析历史上建筑的结构与构造等技术问题的原则下,对中国和日本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屋面构造乃至斗拱搭接作了探索性的技术分析。尽管从今天看来,因材料上的局限,书中对中国和日本建筑的描述不够准确,对建筑结构和构造技术的分析也是较为粗浅的,但毕竟要比弗格生和弗莱切客观得多。应该说,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研究东方建筑,要比纯粹的形式风格上介绍和模仿,在研究深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三、东方艺术史与中国古代建筑

虽然有一些西方学者以独特的眼光探讨了对西方人而言是既陌生又好奇的东方建筑现象,但或因语言的障碍、材料上的局限,或因文化的隔膜、观念上的偏颇,使这些研究往往失于粗浅的采风和牵强的推论。相比而言,同时期日本的美术考古与建筑史家,如冈仓天心、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常盘大定、伊藤清造、八木槌三郎等人,以厚实的汉学

^① 喜龙仁(Oswald Siren)关于中国建筑与艺术的论著众多,其中关于建筑的主要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1924);《北京的皇家宫殿》(*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1930);《中国的园林》(*Garden of China*, 1949);《中国与十八世纪的欧洲园林》(*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0)。他还撰写了《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建筑”条目。



基础,从追溯日本佛教建筑的源流入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考察。他们采取查阅文献、采访记录、实地考察、测绘摄影、考古发掘等多种方法,深入中国腹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取得不少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一个“欧风美雨”席卷亚洲大地的时代,而在当时的日本却兴起了一股考察与研究东方艺术史(包括东方美术史、建筑史、考古等)的热潮。

作为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的冈仓天心,曾多次到中国做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冈仓天心虽只是间接介入建筑史的研究,但他对东方文化艺术成果和优越性的宣扬,却直接回应了欧洲人笔下把东方建筑视为“非历史的建筑”的偏见,也影响了日后数代日本学者往往采用美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方法。

鸟居龙藏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他除了在日本国内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和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和人类学调查,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所著的《南满洲调查报告》、《蒙古旅行》、《从考古学上看辽的文化》等著述中,涉及了不少史前及历史时期建筑遗址。

虽然冈仓天心、鸟居龙藏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所涉及,但他们毕竟不是专攻建筑史的专家,因此其有关东方建筑史的成果十分有限。对中国建筑史展开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推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是日本最初的建筑历史学家之一。自明治25年(1892)伊东忠太提交了《建筑哲学》为题的大学毕业论文后,开始了日本建筑史和东方建筑史的研究。明治26年(1893)在《建筑杂志》上发表的《法隆寺建筑论》论文,已尝试用建筑遗构实地考察与文献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建筑历史。这一方法成为伊东忠太之后研究建筑历史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成就了他在日本乃至东方建筑史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与同时代的日本学人主要选择留学欧美和考察欧美不同,伊东忠太在明治34年(1901)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就游学中国,用了三四年时间考察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建筑。伊东忠太注意到,当时对亚洲建筑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有少数欧洲人有过一些论述,不要说论述的质与量远远不够,其论点也带有许多偏见。对于这一状况,伊东忠太认为亚洲建筑史的研究,日本人比欧洲人更具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更有研究的必要。因此他选择了亚洲作为主要考察地点,而没有选择欧美国家。此外,伊东忠太还认为要认清日本建筑历史,首先必须对日本建筑有着深远影响的中国建筑有所了解和研究。所以在亚洲各国中,他又把中国作为考察、游学的首选地点。

伊东忠太一生致力于日本传统建筑以及亚洲建筑的研究,著述丰富,其中《支那旅行谈》、《北清建筑调查报告》、《支那北京皇城宫殿图》、《支那建筑史》、《支那建筑装饰》、《支那建筑图集》(与关野贞、冢本晴合著)等众多著述直接与中国建筑有关。在1936年出版的《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中,伊东忠太用上册的一册篇幅来写中国建筑史,足见他对中国建筑的了解和重视。他不仅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建筑史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既采用了传统的文献研究与文字考证的研究方法,也吸取了近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从而将中国建筑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针对欧洲中心论,伊东忠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回应。如在1925年写成《支那建筑史》中^①,伊东忠太在第一章第二节,专论“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认为中国建筑是持续进化的,把中国建筑视为“非历史的建筑”是西方人对东

^① 该书于1937年由陈清泉译为中文,改书名为《中国建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方文化艺术的无知与偏见。弗莱彻的世界建筑史“对于中国建筑,亦占数页。然实支离灭裂,不足置论。彼谓非历史的实为偏见”。“彼谓中国建筑千篇一律者误也。实际中国建筑,最多变化。只始见之人,不知其变化耳。例如吾人初见外国人时,为外国人之面目皆一样,及渐细认,乃知各个人中各异其面目。彼批评中国建筑千篇一律者实表示其对于中国建筑观察之浅薄耳。”^①当然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并非要全面地为中国古典建筑正名,其研究的直接目标更多地与确认日本古代建筑的价值相关。

与伊东忠太同时代的关野贞同样关注东方建筑的研究,多次进入朝鲜半岛和中国内地考察。1902年,关野贞开始了对朝鲜的多次的考察,撰写了《朝鲜的建筑艺术》、《朝鲜古迹图谱》(与常盘大定合著)等多种著述。在1903年撰写的《新罗时代的遗物》一文中,他注意到朝鲜半岛还存在有中国、日本已不存在的遗物,因此认为居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半岛在东方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1906年,关野贞对中国建筑首次考察的行程路线选择了与伊东忠太大致相同的考察路线。在此基础上,关野贞于1908年完成了《支那的陵墓》一书。1918年后,关野贞又对中国、印度等建筑及建筑保护情况进行了考察。1925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与常盘大定合著),收录了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在1918至1924年间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省从事佛教史迹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后该书增补了佛教建筑之外的建筑,更名为《支那文化史迹》,成为当时日本出版的中国建筑大全。

此外,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伊藤清造的《支那建筑》、八木奘三郎的《支那住宅志》等都是当时有关中国建筑的重要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主要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立论的,这与冈仓天心所提倡的东方艺术史研究有一定的关联性。

毫无疑问,当时日本人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不过它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传统建筑史的研究,同时也间接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其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活动,即极受日本早期东方艺术史和东方建筑史研究的影响和刺激。如1930年伊东忠太在中国营造学社讲演时称,建筑史研究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则以研究遗物为主。^②1931年关野贞与竹岛卓一考察独乐寺并断定其为辽代建筑后,中国营造学社才从中感到实地考察对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中国营造学社与古代建筑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专门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开展的相关研究活动,书写了中国人较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初篇章。

一、中国营造学的创立

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于1930年^③,在1919至1929年间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酝酿过程。

① [日]伊东忠太著,陈清泉译:《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版,第10页。

② [日]伊东忠太:《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第2期。

③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929年,另一说为1930年。此采后一种说法。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字桂辛，晚号蠖公，贵州紫江人，民国初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长期兼督北京市政。他对宫殿苑囿、城阙衙署，早有研究。民国8年(1919)，时任北方总代表的朱启铃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中经过南京时，受江苏省齐耀琳省长的邀请，参观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这一偶然的机会，朱启铃发现了该馆所藏的《营造法式》抄本。为了《营造法式》能传后世，朱启铃通过齐耀琳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丁本”的《营造法式》。由于“丁本”经屡次辗转传抄，错漏难免。朱启铃认为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更为完善，于是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及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章钰、陶珙、陶祖毅、阚铎等，搜集各家传本，对《营造法式》进行校订。陶湘等学者为此“时阅七载，稿经十易”^①，于1925年付梓刊行。这一版本就是著名的“陶氏仿宋刊本”(简称“陶本”)《营造法式》(见图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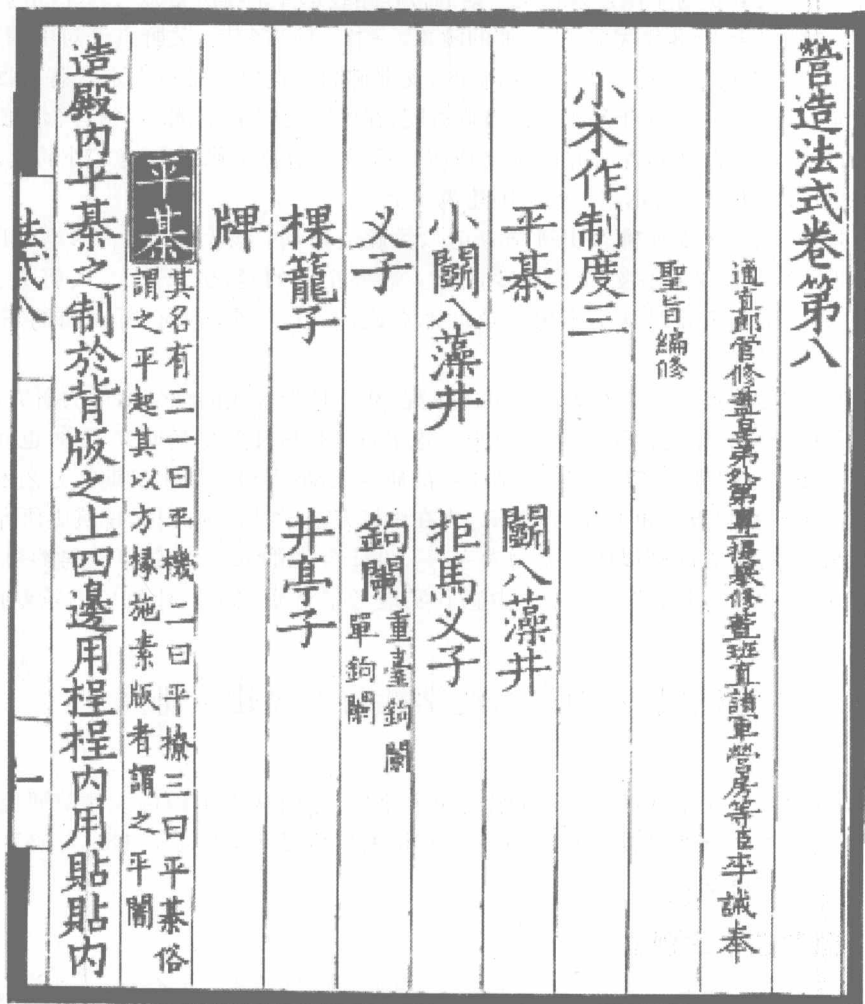


图 0-2 《营造法式》陶氏仿宋刊本

① 陶湘：《识语》，见《营造法式·附录》（“陶本”影印本），中国书店2006年版，第1123页。